

從《四庫全書總目》的著錄看清人 對《歐史》本名的隔膜

辛 德勇

明北監本《二十一史》刊行之後，在社會上的影響，遠遠大於此前南京國子監的刻本。其標誌之一，是汲古閣主人毛氏，在崇禎年間刊刻《十七史》，雖然號稱是以宋刊元槧作底本，但至少在書名乃至題名形式這一點上，卻往往置古刻舊本於不顧，徑行依循本朝北監剛剛印行的新本。如把陳壽《國志》的書名改刻為《三國志》，就是如此。同樣，北監本把歐陽脩的《五代史記》改題作《五代史》，崇禎三年之汲古閣本也是依樣畫葫蘆（汲古閣本在全書卷首另紙開列的書名和各部分卷次，尚題作“五代史記”，部分保存有本來的書名）。值得注意的是，毛晉一家所在的常熟，離南京城很近，而明朝南京國子監刊刻這兩部書，都是遵用其本來的名稱，鑄作《國志》和《五代史記》。然而，皇宮畢竟坐落在北京城裏，北京國子監的地位，自是優於南監。所以，汲古閣所刻諸史，纔會從北而不從南。此外，明朝末年，還刻有一個楊慎評閱的《歐史》，也像北監本一樣，是題作《五代史》。

在北監本和汲古閣本這兩大正史版刻系列的影響下，清朝武英殿刊刻的《二十四史》，同樣多因承這一系統，把《國志》題作《三國志》，把《五代史記》題作《五代史》。大清朝新印的這套《二十四史》，名義上算是乾隆皇帝欽定，權威性較前朝的北京國子監本還要高出很多，從而也更為流行。

殿本《二十四史》中所謂《五代史》，梓行於乾隆初年，到乾隆中期纂修《四庫全書》的時候，此一《五代史》印本，也已經流行三十多年了。在北監本和汲古閣本廣泛流通多年的基礎上，再疊加上這種殿本的權威和影響，很多士人對《歐史》本來的名稱，難免會產生越來越大的隔膜。

歐陽脩的《五代史記》經朝廷大力推崇，頒行於世之後，北宋初年薛居正領銜修撰的《五代史》，逐漸湮沒。至明代中期，原書即已失傳。乾隆中期，四庫開館，從《永樂大典》中廣事蒐羅遺逸舊典，始重新輯錄成書。在寫入《四庫全書》的同時，亦交由武英殿開版雕印，所謂《二十四史》，方克告成。

惟武英殿本《薛史》刻成於乾隆四十九年，而如前文所述，乾隆初葉武英殿刊刻諸史，因其承用明北監本妄改的書名，已經把《歐史》誤題作原屬於《薛史》的名稱——《五代史》；《四庫全書》寫錄的《歐史》，同樣是以《五代史》作為書名。不管是《二十四史》，還是《四庫全書》，同一部叢書中，收錄這樣重要的兩部典籍，書名完全相同，總不太方便；再說兩相並列，愈加彰顯其把《歐史》題作《五代史》的荒謬。

可是，這“欽定”的尊嚴，在什麼時候，都不能輕易放下；況且乾隆皇帝在殘酷整肅讀書人的時候，又忘乎所以，誠心實意地要與文人學士比高低。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如何也是要把面子維護到底的。就像人說了第一個謊話之後，祇能再另編一個新的謊話來圓舊謊一樣，死要面子的辦法，祇有一個，這就是清帝和朝臣們祇能一錯再錯，接着來改易《薛史》的名稱。具體的做法，就是將其改作《舊五代史》。

當時，奉旨纂修諸臣編造的理由，是“薛居正等《五代史》一書，宋開寶中奉詔撰述，在歐陽修《五代史》之前。……司馬光《通鑑》多採用之。當時稱為《舊五代史》，與歐陽

修之本並行”，所以，“擬仍昔時之稱，標為《舊五代史》，俾附《二十三史》之列，以垂久遠”（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舊五代史》卷首附館臣奏章）。但這種鬼話，祇能自欺，實在難以欺人欺世。稍微讀過幾本書的人，誰不知道，所謂《舊五代史》，祇是一種相對於《歐史》的俗稱。

武英殿本和《四庫全書》本《薛史》，在每一卷的開端，都一本正經地題寫：

舊五代史卷某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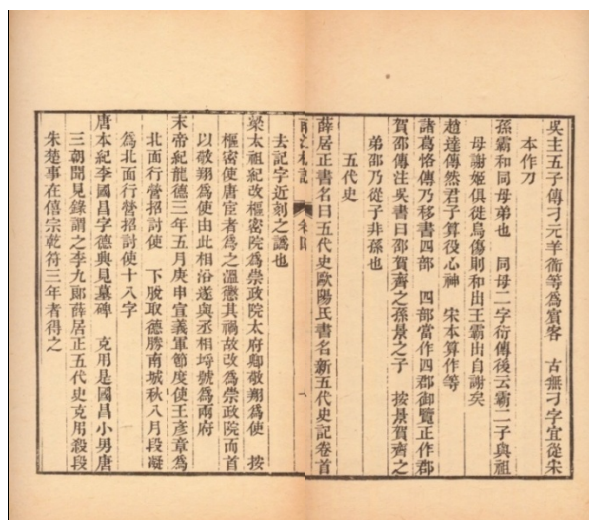
儼若昏了頭的薛居正統領着一幫白癡，明明剛寫了本新書，卻要題作舊史。即以歐陽脩《唐書》與劉昫的《唐書》被清廷分別題作《唐書》與《舊唐書》的所謂“成例”，也不能簡單類比。蓋殿本《二十四史》和《四庫全書》的做法，雖然並不可取，但兩《唐書》書名畢竟完全相同，自有不得已者，而《薛史》本名《五代史》，《歐史》本名《五代史記》，二者區別顯然，若非“欽定”的殿本承用明北監本的謬誤，改《五代史記》為《五代史》，何以會弄出這樣荒誕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心虛，糊弄不住世人，弘曆自己又寫了一首七言長律，以代序文，題目就叫《御製題舊五代史八韻》，這下就誰也不敢再有異議了。

身處如此混亂的局面，在前文所述時人對《歐史》本名日漸隔膜的背景下，四庫館中司職編定《四庫全書總目》的紀曉嵐輩，竟稀里糊塗地選用《新五代史記》這一頗為古怪的名稱，來著錄《歐史》，文曰：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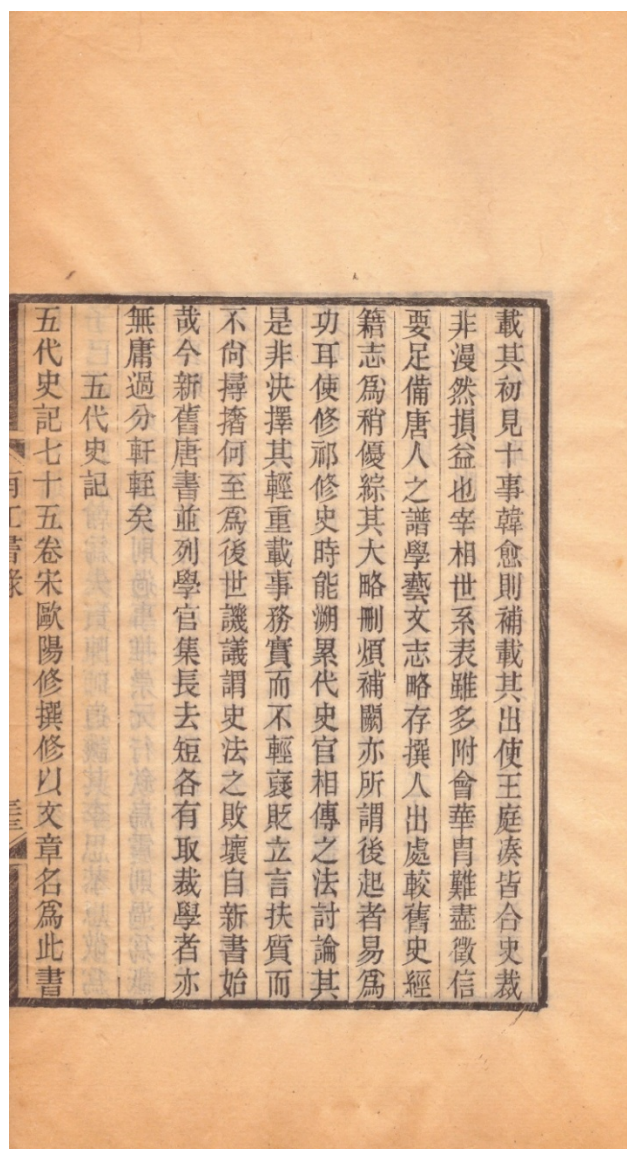
宋歐陽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記》，世稱《五代史》者，省其文也。

雖然中國古代的圖書目錄，一向會以非正式的俗稱別名來著錄典籍。例如，在《隋書·經籍志》中，陳壽的《國志》就被記作《三國志》，何晏等人所著《論語集解》也被記作《集解論語》，《三輔黃圖》則被以俗稱著錄為《黃圖》，等等。歐陽脩的《唐書》和《五代史記》，在元朝官修的《宋史·藝文志》中，也被分別記作《新唐書》和《新五代史》。明此通例可知，《四庫全書》雖然是以《五代史》的書名，寫錄《歐史》，《總目》自可使用其他名目來著錄此書。



中華書局《清人考訂筆記叢刊》影印嘉慶癸亥面水層軒原刻本《南江札記》

所謂《新五代史記》，雖然自宋元以來，即時或有人偶然稱述，個別典籍目錄，如《文獻通考·經籍考》，也曾以此名目來著錄《歐史》（《文獻通考》卷一九二《經籍考》一九），但這本來祇是一種很隨意的別稱，絕非其本來的名稱。關於這一點，有機會在天祿琳瑯藏書中看到過明代未經北監改竄書名之前刻本的乾隆皇帝（見《天祿琳瑯書目》卷八），倒是十分清楚，在《御製題舊五代史八韻》一詩的自注裏，曾經述云：“歐陽修別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但由於北監以來汲古閣乃至武英殿版《歐史》的流行，就連輯錄《薛史》並且為《歐史》撰述提要初稿的邵晉涵，不知是不是受《文獻通考》的影響，起初也曾誤以為“歐陽氏書名《新五代史記》，卷首去‘記’字，近刻之譌也”（見邵氏《南江札記》卷四“五代史記”條）。但後來在四庫館中起草《歐史》的《提要》稿時，由於專心肆力於此，見聞日廣，他已經清楚知悉，《五代史記》纔是歐陽脩自己設定的書名（見邵氏《南江書錄》）。然而，大多數人畢竟不會像他那樣為此花費很大功夫，以致到後來紀昀、陸錫熊等刪改寫定《總目》時，竟又特地把它改寫成了《新五代史記》。溯其淵源，這祇能是本自《文獻通考》的著錄的名稱，而柴德賡先生著《史籍舉要》，指斥四庫館臣“毫無根據”，所說似不盡妥當。



清光緒中貴池劉氏刊《聚學軒叢書》本《南江書錄》

這一情況，足以清楚地說明，在清代乾隆年間，大多數人對《歐史》的本名，已經模糊不清。

近人余嘉錫先生和今人李裕民先生訂定考辨《四庫全書總目》的疏誤，都沒有提及這一明顯問題，或許以為祇是《新五代史》的文字衍誤，不值得追究。但通過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到，在這背後，還有一番需要辨章的學術源流。有鑒於此，我們今天整理古籍，對相關書名問題，更應心存審慎，盡量保持其固有的名稱。

2015年8月23日晨記